

- ▶ 论文投稿
- ▶ 关于论文发布证明

## 相关链接

- ▶ 学术活动厅
- ▶ 专家讲座
- ▶ 中华管理论坛章程
- ▶ 个人专栏



## 必须重视朱熹理学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

曾飞

在中国近代, 朱熹理学对社会的影响极大, 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起了阻碍作用。直到近期和现今, 这种影响仍然无所不在, 思想要真正获得解放, 就必须正视朱熹理学的消极作用, 从朱熹理学无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宋儒朱熹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 集理学之大成, 建立了唯理论哲学体系。

朱熹一反中国哲学“执两用中”的三元论构架, 建立了“理”与“气”对待的二元论哲学, 主张“理”、“气”不相离, 但“理在先, 气在后”, “理”成为世界的基础和根源。“天理”也就成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的一种标准, 一种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必须遵守的标准。人们只有通过“格物穷理”去认知和遵循天理, 才是真、善、美。并以存天理, 去人欲为存养工夫, 在神化伦理纲常的同时, 除去“人欲”, 以此重建精神家园和价值理想。因此, “存天理, 灭人欲”成为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 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宋朝廷发动的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 将朱熹的理学斥为“伪学”, 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 生前终未能如愿。朱熹理学成为统治思想, 是在其身后的元、明、清时代。元代恢复科举后, 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命题。在明清两代则被列为儒学正宗。朱熹理学终于成为官方哲学。钱穆的《朱子新学案》说: “在中国历史上, 前古有孔子, 近古有朱子, 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 发出莫大声光, 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 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在中国儒学史上, 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元、明、清时代的统治者把朱熹理学作为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 作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的所谓“天理”, 推行唯理主义, 扼杀思想自由; “以理杀人”, 强化专制统治, 对中国后期的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 起了阻碍作用。

朱熹唯理论的消极影响深远, 在今日的社会里仍然可见它的阴影。民间迷信“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的格言, 空口讲理而不见诸于行道; 社会沉迷于争论, 以为道理愈辩愈明, 忘记“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行为, 而沦为空谈; 官员号召“理性思考”, 动辄“统一思想”, 妨碍思想自由, 毁坏“和而不同”, 反而不能形成共识, 破坏和谐。唯理论的思想桎梏仍于无形之中束缚人们, 妨碍思想解放的恶性影响可见一斑。

儒学从尊道到讲理的蜕变

要看清楚朱熹理学的实质, 就必须首先认清它对中国主流思想文化传统

的实质性背离。

孔子、老子的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思想的主流传统。这“十六字心经”的意思是舜帝告诫大禹说，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昧难明，只有精诚专一，实实在在地把握住道。其主要含义是：“允执厥中”或允执其中。允执其中也就是要把握住道。而所谓的把握住道也就是用“执两用中”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住最接近事物的自然规律的方法来行事，从而能够尊道而行，获得成功。这种传统是实践为核心的哲学。

孔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主言》）。孔子将德与道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道以明德、德以尊道的关系。孔子对鲁哀公所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即将德视为道之所行。也就是尊道、依道而行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

老子则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明确指出有见识的士人听了道，就尽力去实行它。因为唯有道能妥善引导事物发生并成功遂事。人们把握了道，就是要用道指导行动，去成功遂事。尊道、为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

而理学的主流派程朱陆王虽然也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圣人心传的秘旨。但强调以“道心”制约“人心”，以公灭私，以理去欲，以找回唐末五代以来被破坏了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想，而抛弃了圣人心传的主旨“允执厥中”。也就是抛弃了使用“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方法来把握道，来行道的主旨，把重心转向“道心”与“人心”的关系。从而扬“理”抑“道”，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华思想文化传统。

“理”，是理学派的主要范畴。儒家、道家均无此范畴。《说文》曰：“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韩非子·解老》曰：“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孔子、老子均以“道”为主要范畴。《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道者人所行，故也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也为引导。”道者，可行之路，重在实践性；理者，剖析纹理，在于思索万物之特性，重在理论性。两种范畴有质的区别。

程朱的所谓“理”，来源于佛教。程颐的弟子刘安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程颐回答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程氏遗书》）对程颐而言，“理”的观念是受了佛教的启发。朱熹对程颐的思想虽有继承，但他的“理”的观念并非完全来源于佛教。朱熹的“天理”来自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其中庖丁曰：“……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他正是从这里引出了理为条理、文路子的意思，并推扩为“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朱子语类》）朱熹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是说：“盖为道理出来处，只是一源。散见事物，都是一个物事做出来底。一草一木，与它夏葛冬裘，渴饮饥食，君臣父子，礼乐器数，都是天理流行，活泼泼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来！见得透彻后，都是天理。理会不得，则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

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庄老有这般说话。庄子云：‘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朱子语类》）显然，“吾道一以贯之”对于朱熹来说，就是“天理一以贯之”。把孔子一以贯之的“道”，诠释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范畴“理”。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从传统的“尊道”变成了“讲理”。儒家哲学在朱熹手中已经完全变质了：从一种注重实践行动的哲学，变成一种注重思想控制的唯理论。所谓“讲理”的实质，不是要人们依照自然规律去做事，而是要人们老老实实听从圣人所讲的“天理”，从而严密控制人们的思想，形成一种牢固的思想桎梏，以代替对人身的直接束缚来奴役民众。

朱熹的这种唯理论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殊途同归，目的相同，都是统治者进行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思想控制工具，同样为东西方的统治者所乐用。因而，时至今日，呼唤“讲理”与呼唤“理性”依然并肩而出，成为一些官员图谋控制群众思想时所乐用的时髦工具。

### 儒学从三元论到二元论的蜕变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郭静云（Ольга Городецкая）研究员在做题为《先秦自然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观念》的学术报告时指出，《老子》等先秦文献表达了‘三生万物’的概念，这种三元观为万事万物造化之规律，是先秦自然哲学的核心观念。战国末期以后的文献中的造化三元观均将阴阳二极与其二者之间的和气视为宇宙造化之端。然而，从出土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更早的不同于这种‘阴、阳、和’的三元观”，但是“无论哪种三元观，第三元都有相同的涵义，既表达相辅混合过程，亦涉及‘气’概念，可见三元观之重点在于‘两极和气’。郭静云还认为，三元观是跨越哲学学派之整体文化核心概念”。旁观者清，外国学者郭静云很清晰地看出了中华传统思想的特点是有别于西方二元观的三元观。

确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性差异是：中国哲学是三元观的哲学，而西方哲学则是二元观的哲学。人类对世界的观察，可以用二元观来进行，也可以用三元观来进行。使用哪一种思维模式只是一种选择，并不存在专利权或任何宿命论的安排。在西方，二元观的选择则一直占据主流。中国近代的理学，也选择了二元观，用理、气二元论来描述世界，发展出与西方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相类似的哲学思想来。

所谓二元观通俗讲就是“一分为二”，把一个事物人为地分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再分成两个部分，以此分割下去，形成整个概念体系。

所谓为的三元观通俗讲就是“一分为三”，认为事物都具有两个极端，比如阴与阳、刚与柔等等。这就叫着“一生二”，产生两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就产生第三种状态，这种第三种状态才反映了事物实际存在的情状，这就叫做“三生万物”。也就是用阴、阳、中三元的描述方法来形成理念。

老子将其概括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是两端，“冲气以为和”才是能够反映世界原本存在之情状的方式。唯有“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才能从阴阳两端、两种符号构造出事件万物的表征方式来，这就叫做“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一阴一阳的二，产生出第三类千千万万的各异的事物来。

而理学也从诠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开始来改变传统，引入“一分为二”的二元观，给唯理论奠定结构基础。

《观物外篇》语录：“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而朱熹却说“康节尝言老氏得《易》之体，非也”。……朱熹却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阴阳二画排列为“四象”，阴阳三画排列为八卦，阴阳四画排列为“十六卦”，阴阳五画排列为“三十二卦”，阴阳六画排列为六十四卦。其说“《易》之体”是个阴阳“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无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理会得”。（梁涛：《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一分为二”的二分法构架跃然于其间。

郭彧指出：朱熹的“一分为二”，不是分“太极”一理为二，而是自“两仪”始各“一分为二”。初以一白块为“阳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阳仪”，以一黑块为“阴仪”，分二后其上叠加一阳一阴为“象”，此时有二“阴仪”。待分成六十四卦时，则有三十二“阳仪”和三十二“阴仪”。的确是“黑白之位犹不可晓”。“四分为八”，是分“两仪为八”、“四象为四”。分：到“四画、五画”时则不成卦。的确是“四画、五画者无所主名”。尽管如此，因元、明、清三代，朱熹易学立于学官的地位，学子们还是宗之而不疑。（郭彧：《宋代的易图——朱熹的黑白块横图》）。由此，朱熹不管说不得通，硬是把老子概括的《易》的哲理：三分法改编成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以此承接道统，使自己的理气对待，理在气先的二元论成为“正统”哲学。

“理”、“气”对待和“精神”、“物质”对立相似，都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形成概念。然后把“精神”或“理”的作用无限夸大，成为“绝对真理”或“天理”，用以欺骗人们无条件服从，从而达到对人民思想进行控制的政治目的。

没有这种二元构架，就难以将其中的一元绝对化，把哲学改造成对思想进行控制的便捷工具也就无以实现。

### 屡次陷入“唯理是从”陷阱的教训

正是由于朱熹理学成为中国近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使得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很容易地全盘接受了教条的苏式哲学，导致思想僵化，造成严重损失。

之所以很容易全盘接受，是因为理学的唯理和二元论与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唯理和二元论本质性同构。通俗讲就是两者非常相似，所以很容易接受。

“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苏联哲学体系定了型。由此而在世界上首次出现了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哲学。这些作品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那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和理论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程度和掌握的水平、苏联式的思维方式（现在有的理论家把它概括为戾换式的逻辑）和苏联式的理论工作作风。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肤浅、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极端化、政治化。斯大林和米丁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

粗俗理解(包括曲解)和简单化的表述,在当时曾以党中央决议这种指令形式把它规定为经典,确立为绝对不许有半点违背或逾越的准绳(甚至成为划分敌我、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在1953年他逝世前一直被说成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贾泽林:《从苏联哲学的演变看苏联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这种将哲学理论绝对化,使之成为不可逾越的准绳的做法,对于习惯了唯理是从的中国人,马上就能无条件地接受,被当成正统理论,迅速形成新的“天理”以取代原有的三纲五常的“天理”,人民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没有得到恢复,世界先进的思想没有被吸收,思想只是变一种方式被禁锢,因此给我们的事业,给中华民族的复兴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这是惨痛的教训。

邓小平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切中要害,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捅破了正统理论是不可逾越的准绳的谎言,开始了恢复中国尊道、为道的实践精神的旅程。

但是,新的理性疯狂,用西方理论替代苏式教条来作为中国人的“天理”的恶浪又迅速兴起。人们依然没有吸取教训,从根基上抛弃朱熹的唯理论,依旧把“不可逾越的准绳”之类的“天理”空缺当成憾事,孜孜以求,谋求寻找一种新式的理论来填补这个空缺。于是有了全盘西化、“普世价值”之类的喧嚣。

因此,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在必行。不根本消除唯理论的束缚,让思想自由,确立实事求是,实践精神,我们的民族振兴就没有希望。

摆正位置:以人为本,理论是人的工具,而不是人的主宰

人们追求真理,原本是希望通过获得真理,为人类的福祉而增强理论工具的威力。掌握有力量的理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造福于人本身。不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其颠倒,把真理神圣化,成为“天理”、“绝对真理”之类的人类命运的主宰,并用它来奴役人。

邓小平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另一个创举,就是提出了“猫论”,使被颠倒了的人与理论的关系重新被颠倒过来。

所谓的猫论,就是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讨论到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了支持态度。他说:“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总之,要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显然,所讲的“道理”、“方法”,就是为了用于恢复农业,不是为了镇服人。也不仅仅是用来判断陈云同志道理讲得对不对。总之,主旨是理论与方法是为人所用的。

邓小平还说过: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

“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我是实事求是派。”

很显然，捉到老鼠不仅仅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任何道理就是要为人所用，用来捉老鼠的。决不是用来束缚人的。因此邓小平才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主张“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而不是把理论变成政治游戏的工具，做为整人和控制他人的权术利器。理论仅仅是在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更有效地获得成功，它才是有意义的，才配称为真理。而理论用以指导实践行动，开拓新路才是第一重要的。

这种以人为本传统精神的恢复，是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在苦难中百般努力才得来的，我们应当珍惜。

1976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那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阶段。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以批邓促抗震”、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要从属于“政治”、“政权”和“斗争”。（经济观察报：《当年唐山地震的报道》）我们从记者哪里得到我们不愿听到的信息：……反复播送着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告，大意是，“……全体市民要保持镇静，提高警惕，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得擅自进入工厂、矿山、银行、粮店、仓库、商店等地方，严禁抢劫，违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凤凰网：《摄影师忆唐山地震》）。

而在今日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的是大爱，是正义，是和谐，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人本思想的光辉！我们应该珍惜这种中国人文传统的复归！

痛苦的经历，惨痛的教训，应该使我们明白：只有人，只有人民才是核心，才是根本！一切理论都是工具，它仅仅是人用来为人类的福祉服务的思维工具，而决不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天理”！我们再也不能让所谓的“天理”或“绝对真理”来主宰我们的命运了！这就是思想解放的主旨。

---

最新文章：

- [官僚意识与人文精神](#) 曾飞
- [立此存照：高尚与丑陋的反思](#) 小龙
- [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约束](#) 陈柳钦
- [当“优秀工”成了鸡肋](#) 韩成杰
- [知识生产管理](#) 侯象洋
- [中国移动品牌文化的硬伤及危害](#) 韩城
- [管理升级——给准备带领企业越冬的企业家](#) 张驰
- [重大疾病保险 职工的保护神](#) 周书勇
- [有效在线体验——为什么你的VOC项目对提升在线客户满意度的帮助很小](#) 李翊玮 等
- [和谐生产方式基本原理](#) 张西振
- [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高磊
- [时间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高磊
- [李老庄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 陈杰

- [更多文章...](#)

[首页](#) | [关于VCMC](#) | [资料搜索](#) | [联系我们](#) | 建议使用IE6. x版本，显示分辨率1280x1024或1024x768

中华管理论坛、厦门学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998-2008. [闽ICP备05022209号](#)

联系电话: 0592-3222515 传真: 0592-3222515

VCMC